

李白家世探微

王文才

有关李白（701—762）家世的原始记载，一出于临死前自述，李阳冰替他撰写《草堂集序》略为道及；一出于其子伯禽手疏，逝后五十余年，范传正重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加以转引。序和碑文的材料，并来自本家，都说他是“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李白《与韩荆州书》自称是“陇西布衣”，《赠张相镐》诗亦称“家本陇西人”，凡叙祖籍，前后一致。唯对先世破落，西迁碎叶的实情，自己却讳莫如深，《集序》和《墓碑》也措词含糊，寓意言外，引起人们不同的揣测。

他家与西凉王室休戚相关，在西迁碎叶前还有过一段亡国奔流的艰苦经历。此即李白《安州上裴长史书》所说：“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对于这次遭难，前人似少注意，甚至与“窜于碎叶流离散落”混为一谈。郭老便曾怀疑“咸秦”二字是“碎叶”之讹，乃后人就伯禽手疏蠹蚀残破处以意补成。咸秦与碎叶字形不类，何况国破在前，窜谪在后，今合为一，偶失考订。弄清前事的细节，将更有助于辨析李白是否冒籍陇西，攀附帝裔的疑虑。

400年，沮渠蒙逊取代北凉段业称张掖公，李暠亦以敦煌太守称凉公，又五年建都酒泉，国号西凉。李氏“遭沮渠蒙逊难”，历时二十多年，过程比较曲折。420年西凉为北凉所灭，沮渠先破酒泉，暠子后主李歆战死，次年破敦煌，李恂自杀。李翻的儿子李宝也被押送北凉都城姑臧（今武威），年余宝随舅父唐契出逃，投奔伊吾（今哈密西南境），向茹茹称臣，契受封为伊吾王。又二十年，魏灭北凉，凉王走鄯善（罗布泊西）；契亦降魏，为茹茹所逼，转攻高昌（吐鲁番东）。高昌本是西凉旧郡，西凉亡后，阚爽于太延中据地自任太守，因遭唐契进攻，即引鄯善的沮渠为后援。茹茹追至，唐契战死，北凉沮渠余众乘势东并高昌（以上参见《魏书》沮渠、高昌及唐和等传）。这场混战，李氏宗族饱经流离之苦。契死后，弟唐和又往依车师前部王（吐鲁番西交河城），继从魏师讨专奢，因“招谕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送诣敦煌”（见《魏书》车伊洛传）。太平真君三年“李宝据敦煌，遣使内附，十二月以宝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见《北史》魏太武纪），然后定居于此。西凉亡国，李暠各房子孙流散二十余年，迄至招谕李宝，其余家族也随着重返故乡，这是442年的事。

李白追忆中的“奔流咸秦”，正指其六七代祖于国亡后，长期展转流离。据上述李宝的行迹，约在今新疆东部和甘肃西境；李白祖辈的流亡，则在咸秦至秦州一带地区，未从李宝西行。李宝回河西后，世为上蕃大姓，“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见《新唐书·高俭传》），次子茂袭公爵，为陇西敦煌房的始祖。李白祖辈同被招

还，“因官寓家”，也历仕北朝，“蝉联珪组，世为显著”，属陇西另一支房。“寓家”之处，即《上裴长史书》所说：“本家金陵，世为右姓。”明人已指出李白祖籍所在，不会是江南的金陵，清人疑是金城之误，或释为西凉侨郡建康的代称，都在今甘肃中部。西凉建康郡治乐涇（见《十六国疆域志》），武周时曾在河西节度使（驻武威）下设“建康军，置在甘、肃（张掖酒泉）二州界”（见《唐会要》78），承用旧名，亦当汉乐涇县地（今高台县境）。近代武威南山出土《西平公主墓志铭》中又有“凉州南阳晖谷冶城”，即今武威县南五十里上古城。冶城、金陵同是借称，似建康郡曾经改置于此。则李白世系原属陇西姑臧大房，是李宝长子承姑臧侯的后代。“因官寓家”实始李承，应无可疑。固然，李白诗中屡见行辈错乱的现象，但古代各家谱牒，彼此互异，也是常有的事。宋人撰《唐书》世系表，承用各地族谱，多所谬误，前人已有说明，故不能据以证明李白是虚造谱系。或考李白前辈系出重耳（李歆子），与李虎为弟兄，至达摩一代，世系失传。但重耳在凉亡后即南逃入宋，到李宝回敦煌时，也率族人北归，仕魏为弘农太守。而李白的祖辈，逃奔于渭水陇山之间，东不出关，随着李宝的招谕，便返河西，与重耳行踪不合。总之，“流奔咸秦”早在420—442年，“窜于碎叶”迟至620年，相距约二百年之久，不容误混。

至于窜滴碎叶的事，李《序》只泛说：“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于谪居的时间与地域，不太明晰。赖有范《碑》可作补充：“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前者有慨于“非罪谪居”，引而不发；后者点明“隋末多难”特定的战乱背景，而又婉言带出宗室一房被迫流窜，令人深省。综合二文，李白的前代是在隋末兵争之际，以非罪遇祸，被窜于碎叶，甚至改变姓名，隐藏起来。对此，近人尤多异说，纷歧颇大。

或按流罪的常例，徙配边州，必须发牒遣送，交由当地看管。因据《新唐书·地理志》贞观十八年（644）始置焉耆都督府的年代，以碎叶设镇屯军“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之后，始可成为窜滴罪人之地”。乃置隋末被窜之事于不顾，疑“其为依托”之词，不免千虑一失。或更下移谪居的时间，在隋亡七十年后，谓因垂拱四年（688）扬、豫、博三州起兵反对武则天而被谪。及神龙元年（705）李唐子孙皆复属籍，唯三州不赦，则李白父亲必为扬州刺史李敬业、豫州刺史李贞和贞子博州刺史李冲的同党。竟又臆改隋末发生的事，远涉武周之时，尤觉不顺。有的却上移罪谪时间到隋末以前，认为李白先世流寓异域，是在隋平吐谷浑控制了西陲，设置鄯善、且末四郡之后。“六〇九年隋炀帝发天下轻罪徙居西域”，李氏亦被徙于且末，继经大乱，“李白先辈或是从且末展转跋涉，最后终于在碎叶定居下来”。此在西迁途中，增入初谪且末一事，有待他日才得机会转移碎叶，似费周折。并释“非罪即非所罪，也就是轻罪重罚”。那么，因罪发边，何至于弄到易姓隐名，子孙匿迹；况隋亡后，旧令已经失效，自可反回故土，又何须远徙碎叶，必经数代才逃来四川，如此俱难解说。

李阳冰明言这次遭祸是“非罪谪居”，有如孔子去鲁，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实因无罪而远窜，隐迹以避祸。造成流窜的原因，虽著笔隐晦，却已透露有过严重的政治事故，而且与唐王朝的禁忌有关，才落得易代九十年后不敢回乡，可见所谓“非罪”

的内容，决非一般细事小故。这为我们抉隐发微，提供了探究问题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李阳冰在叙述非罪谪居之后，又吞吞吐吐地续书：“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耀，亦可叹者”。这不单纯是以李渊前代的中落，与李白上辈的破败，相提并举，更在有意无意间道出了罪谪与唐朝建国的关系。否则只叙说李白上辈被窜之事，何必费词牵涉帝系的兴衰。史称：“自穷蝉（颛顼）以至帝舜，微为庶人”。用在这里，显然是借指后主李歆失国，中经五代，不能大明于天下，至李渊称帝，然后复位。所以要正面涉及李唐开国之事，实以暗示“非罪”的祸根，即始于此，加以罪名的是唐皇而非隋帝。若即若离地把李渊一房的兴起，与李白一房的衰微联在一起。其意若云：自西凉覆灭以来，及五叶而李渊大耀；李白一房却以无罪远离，使“世为显著”之家，一蹶不振，彼兴此衰，亦有可叹。只是蒙受罪谪中多隐情，不便直言罢了。

隋末农民起义，烽火燃遍南北，地方武装乘机而起，争夺政权。陇西李氏亦多参予起兵，有的割据一方，与李渊集团长期对抗，后来便被作为叛逆处理，貽祸子孙。如李宝的五世孙大师，会“窦建德据有山东，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师，而建德违约，又助世充抗王师于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平，遂以（大师）遣徙配西会州”（见《北史·序传》）。细审《碑》、《序》隐意，李白的前代疑有类似的经历，且更甚于大师，才弄到亡命埋名，逃窜远方。考隋唐之际，陇西诸房中与李渊并争天下，结仇最大的恰是姑臧李轨，李白祖先本寓家于乐涪或武威，遭遇祸难又值其时。以意推之，当李轨自立时，或曾卷入两系的争夺，终于一败涂地，破家逃亡。《旧唐书·李轨传》载：轨与李渊互称为从兄从弟，同是李暹的七世孙，比李白都高两辈。隋恭帝义宁元年（617）李渊起兵，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富好任侠”，亦自称河西大凉王。西突厥驻会宁川（甘肃靖远）的阙度设可汗，先降李轨，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阙度设率众内附。李轨破突厥，改尊号为大凉皇帝，并攻取张掖敦煌西平抱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声势壮大。李渊欲联合李轨以孤立薛举，曾派人去凉州加封为凉王，轨不肯受。武德二年，轨阻兵恃险，连结吐谷浑突厥（按《隋书·裴矩传》阙度设原以虏获吐谷浑致富），继续对抗，李渊便派人混在李轨左右，把他捉了。“轨至长安，并其子弟皆诛”。李白的先辈与李轨本属同房，或曾为大凉政权中的要员，轨兵败后，势必远走边地，隐姓逃生。所谓“一房被窜，流离散落”，恐不只李白一家，似包括居于甘凉诸州与李轨有牵联的同族而言，俱奔他方。范碑对此特书“被窜”二字，说明曾受到唐朝的下令追捕，被迫逃窜。李序的“非罪”二字，似指因李轨之败而受累，遭致横祸，延及后代。事果如此，则李阳冰和范传正对这项家史，怎敢正式形诸文字，鸣冤辩屈！《集序》寄慨于唐室的重兴，微露李白先世的破败；《墓碑》托词所得“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使事在恍惚迷离之间；都怕干犯朝廷法禁，故为弄文敛笔，留有余地。

范《碑》确指李白祖辈“被窜于碎叶”。碎叶城历代是我国西境的边防重镇，当中亚伊塞克湖西三百里。552年突厥灭茹茹，崛起西北，组成多部族的王国。原建于龟兹北山的统叶护可汗，自615年后并铁勒、败波斯，称霸西域，设夏帐于千泉。千泉东四百里即碎叶城，“十姓可汗每立酋长于此”。隋末碎叶犹在边地民族的占领下，唐平西突厥

前追捕不便，足以安全避祸。因此李白的祖辈逃到这个“诸国商胡杂居”的边镇，隐藏下来。李《序》却又说是“谪居条支”，这里的条支既非古代“安息西”“大秦东”，近临西海波斯湾的地带；也不是平西突厥后，取古地名配置的条支都督府，当大雪山西部地区。六朝以来，习称波斯为“古条支国”（《魏书·西域传》），范围很广；而唐时的大食“东西万里”，西并波斯，东邻中国，天宝以后又侵入碎叶西部地区。李阳冰写序时，碎叶尚在大食控制之下，故借古名作为代称，以至地望不明。《新唐书·文艺传》改书为：“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仍用大名，泛指葱岭以西。《舆地广记》绵州彰明县引“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尝流隼州，其后内移。”碑为唐梓州刺史于邵撰，隼州当是西州之误。《晋书》称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本指河西，此又借指西域。

李白的先辈潜居碎叶将近百年，705年他的父亲才携带全家内迁，于“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方輿胜览》引序文，下增“之昌明”三字，在今江油境内）。所谓“逃归”，乃是未得唐王朝的赦令，私自遁还。对此，过去也有不同的理解，或以为是“为避难、避仇、避官事逃到四川”；或说因碎叶地区发生战事，城内缺食，得到守兵的默许，“李白一家偷偷逃回内地”。都只从碎叶着眼，而没有考虑到唐朝政治形势的变化，才有可能逃归。固然，703年后突厥乌质勒兴起，“碎叶地区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战乱频起”，以至围攻碎叶数年之久。但唐以来，碎叶屡经战乱，李家都未逃走；及平西突厥后，龙朔元年（662）以西域分置府州，十姓部落“久为唐编人”，道途畅通，而李白一家却迟四十年才离开，只论碎叶的形势，恐不全面。必须联系唐朝内部的巨变，在于武则天篡唐以后，整个政治局面已根本不同，原来李氏宗族间的旧仇，及其罪犯子孙，已减去压力，才得私逃内地。

武氏夺权，对李姓子孙采取的毒辣手段，一面是残酷镇压，剪除枝叶。“自垂拱以来，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家”；至天授初，“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或逃遁民间，为人拥保”。一面是假意安抚，缓和舆论。从睿宗李旦以下，“皆赐姓武氏”，除唐宗室属籍（以上并见《通鉴》长寿、天授、神龙各年）。不但在朝的金公主“仍改姓武氏，更号延安大长公主”，使为己用，远在陇西的族女，也受到优待。圣历二年《大周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载：

“公主陇西成纪生也，即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也（按《唐会要》六云：公主乃“宗室女”；《册府元龟》979云：“则天长寿三年二月西平大长公主（入朝）还番，公主者太宗族妹”。）以贞观十七年出降于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诺贺钵（按贞观九年讨平吐谷浑，授封为西平郡王，十三年来朝许婚，咸亨三年迁灵州）。主乃赐同圣族，改号西平”。久视元年还加封公主的孙子“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以此表示拉拢远地的李姓亲属，同时借以招抚吐谷浑。西平赐姓一事，固与李白父子的内归没有联系，但在陇西远房能得武周优容的气氛里，先朝罪谪的后裔，自有了安然回反的时机。在没有正式赦免的情况下，李白随父从碎叶“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范碑》）。这时中宗已经复位，武三思与韦后结党专权，“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对李白父子说来，还是比较顺利的环境。“复指李树”，恢复了本姓，寓居昌明。李白父子迁来昌明，也是投奔亲族。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载：“龙洲牛心山古观，即大唐远祖陇西

李龙迁所居。既没，葬于山侧，乡里立祠号李古人庙，武德中改为观。其后武氏篡国，潜欲革命，凿断山脉”。及玄宗入蜀，以“国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为州名”，遣使修祭。至德、长庆、宝历、中和各代，俱加崇礼。龙洲原有一支李氏族人，他们父子的迁入，实依本宗寓居。

李白自视为宗室世胄，而对“地实寒微”、“窥窃神器”的武则天，似无恶感。晚年流放夜郎道中，还赞誉她是“炼石补天维”的娲皇。这与《西平公主墓志》中的颂词颇为类似。颂云：“我大周以曾沙纆地，练石张天，万物于是惟新，三光以之再明”。敦煌地区同样编造“民谣”来歌颂这位“圣母神皇”（见《沙州志》残卷）。当其白首南迁，回忆幼时归蜀，旧感新怨，情溢于词。李白和武氏旧人，还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前配许氏，是由“故相许圉师家见招，妻以孙女”（见《上裴长史书》）。圉师前在高宗龙朔中，当武氏篡权主决百司奏事时，曾为左相。后娶宗璟之妹（见《留别宗十六璟》诗），更是则天外侄宗楚客的孙女，楚客为神龙时权相，又是武韦私党。李白与武周人物如此密切，纵不能认为有政治上的牵涉，至少可以说，他对武则天和李隆基两个政权，是没有严格界线的。而他们父子因武周易政得以逃归，确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中宗死后，李隆基诛韦党，拥立他的父亲李旦；又诛武氏和太平公主余党，巩固了自己的皇储地位，最后取得统治。这对李白又变了政治气候，说得严重一点，旧案是随时可以揭翻的，处境未必很妙。他先后投书乞荐，都没有结果，从以上蛛丝马迹观之，在当时臣僚们的眼光中，他还潜伏危机，不敢引进。最后推荐他给唐玄宗的是道士吴筠，而不到一年光景便赐金还山，受到有节制的驱逐出京。李白自叙乃“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实际内情，不得而详。李阳冰只说是同列者“害能成谤”，魏颢序文则指名是“以张垪谗逐”。可能他们都抓住了李白前辈与唐王朝的旧隙，进谗中伤。历来流传着“力士脱靴，玉生青蝇”（见贯休《古意》），本是小说家言，难于尽信。高力士与张垪、杨妃之流，同伙作恶，谤毁李白，固是事实，但不能用传说代替史事，作为被逐的原因。天宝初，高力士已进封渤海郡公，四方表文必先呈阅，将相大臣也靠他维持地位，太子以兄事之，诸王公主呼为阿翁，哪是一般的宦官！李白不事权贵，藐视邪佞，董龙鸡狗，不屑攀缘，已很难得。一个小小翰林，何至得意到能叫力士跪地脱靴的地步！这个故事本是唐人逐步加工渲染而成，原说是“内臣掖扶之”（见《本事诗》），渐传为“中贵人以水沃之”（《摭言》），终究演成“令高力士去靴”，乃怀恨进谗（《酉阳杂俎》《国史补》）。传说本身反映了社会对高力士和唐代后期宦权的鄙弃憎恨心理，以及对李白的崇敬，故为人们乐闻喜道，广为流传。及到宋时，经传奇名手乐史写入《李翰林别集序》，《新唐书》采入本传后，便传信为真了。从事实上找寻渊源，李白前代的窜谪和逃归，正与唐室内部政治斗争紧密相关，并影响到他一生的遭遇，高力士张垪等从而构谗，以至闹得偃蹇终身，说来也较合理。

唐三百年中，李宝裔孙占籍敦煌姑臧，世代冠纓，从未衰落，仍为天下高门。故显庆四年诏禁陇西李宝等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见《唐会要》83）。姑臧世系已载《唐书》，敦煌世系略见千佛洞大历十一年《陇西李氏先代碑记》，云：“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其先指树命氏，紫气度流沙之西（以下转入14页）

构的官僚化。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办法强加于城镇集体企业的头上，以致现在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把民主管理的优良传统丢掉了。我们认为应该把它恢复起来。

城镇集体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方式，注意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产销关系，因而具有经营灵活，与市场联系紧密，适应性强的优点。文化大革命以前，城镇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是比较灵活的，如前门设店，后院办厂，走街串巷，游乡赶集，早晚营业，送货上门，等等。这样既方便了群众，增加了营业额，又能了解群众的需要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改进产品花色品种和服务方式，作到产销对路，满足社会需要。今后需要大大地发扬这些优点。

现在，党中央一再指出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中共四川省委又发出了《关于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我们相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指引下，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必将在实现四化的伟大长征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上文紧接 54 页）（按用李耳故事，近代甘肃清水县出土《李虎墓志铭》亦云：“公陇西成纪人，厥生树下，而因李姓焉”）；刺山腾芳，□名感悬泉之下（李广利故事，见唐抄本《沙州志》：广利伐大宛回，“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时高射虎，人望登龙（李广李膺故事）；开国西凉，称藩东晋（李暠李歆故事，刘裕尝封歆都督高昌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咨议即兴圣皇帝十三代孙……六代祖宝，随使持节侍中西陲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玉门西封邑三千户。曾祖达，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垂条布颖，业继弓裘；筑室连闾，里成冠盖”。此碑世系也有可疑之处，碑主太宾为李暠十三代孙，则应称暠孙李宝为十代祖，被降为六代祖，受封于隋。足见唐时各家谱牒参错，是以李白诗中行辈紊乱，亦不为怪。按碑所叙，李达为唐敦煌司马，“后因家焉”，或是重新迁回敦煌的一个小支。碑阴有咸通间《李氏再修功德记》，继叙历代仕宦，大中间李明振娶河西陇右十一州节度使张义潮女，被荐入朝等事。对比李白这家，却大殊异，“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天宝元年曾下诏，“凉武昭王孙宝以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唐会要》65）。李白当时身在翰林，虽系出姑臧大房，仍不得认许同宗附籍，原因正由于旧案未销，不被追究已是万幸，漏不漏籍还是次要的事。姑臧诸李中，李轨受刑，大师被徙，李白的祖上则窜身匿迹。不因“大逆”构祸，焉能子孙漏籍。

偶涉旧史，旁及李白家世问题，推而论之，更有待于详考。